

热议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记者 王媛媛

金融开放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一直是陆家嘴论坛的特色议题。

6月20日,2024陆家嘴论坛“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 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体大会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中国“人世”20多年来,主动有序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诸多成果,尤其是保险、期货等行业一直走在开放的前沿,为金融开放持续积累有益的经验。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更多应从制度型开放入手,如优化外商营商环境、自贸区先行先试等。

集成果,积累开放经验

保险业是中国金融行业中开放最早、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其中,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是以服务保险机构为主的专业性业务领域,是现代金融保险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再保险集团是再保险的“国家队”。“再保险作为最早开放的金融行业,在全球化发展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中国再保险集团总裁庄乾志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再保险在中国金融行业深化国际化进程、对外开放方面,走出相对稳健成功的实践之路。目前在财产险的再保险领域,拥有的市场份额达26%;在寿险再保险领域,拥有超50%的市场份额。

在庄乾志看来,通过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好为未来改革开放作出金融应有的贡献。

我国期货市场开放力度也在不断提升。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国际化始于2018年。随着原油期货上市,以及20号胶、低硫燃料油、保税铜、原油期货等一系列国际化品种逐渐上市,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步打开。

“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商品期货交易所特别依靠对外开放。”上海期货交易所总

金融开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不同时期对开放的要求不尽相同。当前,我国金融开放正由金融资源和要素流动驱动的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经理王凤海强调,对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来说,开放是必由之路,开放是手段。上期所的外向型品种比较多,对外依存度很高。只有通过开放,才有可能把境外投资者吸引进来,参与到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形成过程中,交易所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上期所正朝着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的方向稳步迈进。王凤海表示,上期所将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加大品种开发力度。同时海纳百川,吸引全球相关参与者参与市场交易。另外,稳中求进,完善监管体系。继续探索“走出去”,便利交割体系。

寻路径,推进先行先试

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需稳步向前推进。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要素市场和机构等主体持续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开放策略,积累更多积极务实的开放经验。

“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多地从制度型开放入手。”中国银行行长刘金



王媛媛 摄

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外商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到中国展业兴业。二是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载体,推进上海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三是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能力。在“引进来”方面,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要全面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在“走出去”方面,关注跨境投融资渠道潜在的风险传导,强化对海外业务风险的管理,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的应对能力。

1994年,在一场影响深远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外汇交易中心应运而生。2024年是全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成立30周年。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刚表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一直以渐进式、管道式为主,在当前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指引下,以往以金融资源和要素流动驱动的开放,有必要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对此,她谈了三点建议:首先,要对标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一些规则,精简

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金融市场的法治建设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根基。

其次,推进制度型开放应该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开放路径。目前,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进行债券交易占比超过60%。“互换通”上线一年多,成交规模实现了数倍增长。

此外,金融制度型开放要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应诉求,增进沟通协调

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应持续倾听来自一线的声音,针对性解决外资金融机构在展业兴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花旗日本、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总裁龙明睿(Marc Luet)表示,“我们高度赞赏中国监管部门对跨境数据传输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这样的工作态度和成果,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也可以提振市场主体

的信心。”

制定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则和政策,减少相关领域的障碍,使国内外金融机构都大为受益。龙明睿说,“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继续积极主动与市场进行沟通协调,更好地简化程序。”

营商环境的稳定,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龙明睿表示,“我们看到了中国持续进行金融开放的努力和决心,国际社会也非常期待继续看到中国市场表现出足够的透明性和一致性,政策能够保持一致和透明,让我们对营商的未来有更好的预见性。”

外资金融机构能凭借集团全球网络资源、产品优势,在中资企业机构“走出去”和跨国企业“引进来”上,为提供相对有竞争力的跨境产品和服务作出贡献。

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财务官兼中国区联席首席执行官何耀东说,“我们很高兴看到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外资金融机构这方面的特色,在一些具体金融举措方面作出差异化的考量。比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承销商评定等方面。”

他也提出了一些期待,未来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在监管法规、市场准入、日常监管指标制定过程中,继续充分考虑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特点,逐步实现基于风险分析、差异化监管,进一步推动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健康发展。

此外,打造一流资管市场是高水平金融开放的重要环节。资管市场在开放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先进的国际发展理念。路博迈集团首席运营官安迪·科马罗夫(Andrew S.Komaroff)表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需要循序渐进的演变和发展,可用“DISNEY”缩写来概括。

科马罗夫介绍说,“D”是数据管理;“I”是创新;“S”是标准;“N”是初期,目前很多中国企业还处于初期阶段;“E”是环境;“Y”是收益率,通过提供风险调整后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增加个人投资者的选择,并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

多方聚力求解养老金困局

记者 余继超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养老金融作为银发经济的一环,也是我国金融强国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6月20日召开的2024陆家嘴论坛“银发经济与养老金融”全体大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优化养老金融政策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提升第二、第三支柱的吸引力与覆盖面,有助于解决养老金储备不足和养老风险保障不足的问题。

养老金储备不足是主要矛盾

人口老龄化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中国也不例外。施罗德集团中国事务主席吴思田(Sebastian Wood)表示,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重大经济挑战。在未来30年,中国将见证其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全球其他地区。

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今井诚司也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这在全球都是如此,特别是现今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值得引起关注。在中国,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15%以上,使得中国也成为了老龄化社会。”

我国已经建立了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三个支柱很不平衡。到去年底,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0.7亿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参加人数近7600万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开户数超过4900万个,遗憾的是账户空转率约七成。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裁蔡希良认为,不仅第三支柱是短板,第二支柱也有弱项,目前企业年金覆盖率还比较低,必须尽早采取行动,大力提升第二、第三支柱的吸引力与覆盖面。

在老龄化叠加低生育率的人口趋势下,我国应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积极应对养老金缺口,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和养老市场建设。

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蔡希良指出,“需求方面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实际是不高的。国际组织有一个养老金替代率55%的指标,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指标。养老金替代率低,就导致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难以形成有效需求。”

在养老供给方面,蔡希良认为主要有几个问题:一是养老服务的供给不充分、不平衡。比如养老设施供给错配,去年北京市养老机构总体入住率只有38%,比较低。供给错配是主要的原因,2/3以上的养老机构在郊区,但是3/4的老年人口居住在城区。

二是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方式,居家长期照护、助残、助医等需求较大的适老化供给严重短缺。此外,医养综合服务保障水平也有待提升,目前绝大部分养老机构‘只养老不医’,但是医疗机构‘只治病不养老’,老年人难以同时获得生活照料和医疗养护。在供需矛盾当中,主要矛盾还是养老金储备不足的问题。”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谷澍指出,



余继超 摄

当前银行业在养老金融方面已经破题,与实际服务需求相比,在进一步丰富金融供给、提升服务效能方面,还面临不少难点和堵点。

“一是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见效相对慢一些,养老产业普惠性经营主体面临如何盈利、如何取得担保等难题。二是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县域人口迁移,转化为新市民,但是与之配套的养老基础设施和金融供给相对薄弱。三是银发经济与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家合力打造完善服务生态,将难点变成亮点。”谷澍表示。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融

发展银发经济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养老金融作为银发经济的一环,也是我国金融强国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蔡希良表示,党中央部署“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就是解决养老金储备不足和养老风

险保障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发展养老金融应该要把握好这个功能定位,在顶层政策、激励政策以及产品服务的提供等各个方面,切实体现政策的一致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引导广大社会民众通过科学规划,为老年生活提供稳定、可期的现金流,以及健康医疗等必要的风险保障。

另一方面,蔡希良建议,优化养老金融政策体系,研究取消企业参加第二、第三支柱必须先参加第一支柱的要求,适度提升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同时优化个人养老金领取时无差别征收3%的个税,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灵活就业人群等全程免税。

同时,促进养老金融与养老产业的高效互动,为提升养老产业的可持续性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在养老产业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运营效率比较低,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蔡希良认为,可以通过养老金融+养老服务、养老金融+健康管理,探索养老金融与养老产业的深度协同,来破解养老产业低盈利所带来的难题。

明晟公司(MSCI)执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及亚太区业务部总裁长泽和哉表示,银发经济的基础是养老金融体系,意味着政府和养老金融体系合作,要尽可能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

吴思田建议,将国际资产纳入中国养老金投资组合,因为中国国内养老金市场的增长将远超过其资本市场的增长。此外,全球多元化投资可以为中国养老金计划成员的投资组合带来重大的收益。

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建议,长期护理险(下称“长护险”)应当成为一种强制保险,全民覆盖,推向全国。中国从2016年开始长护险试点,在制度和规范上还不统一,在服务的内容和标准上也各有差异,目前急需顶层设计,既要有立法又要有规制。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赵永刚表示,养老金融既是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发展养老服务业和产业的支撑力量,保险业应积极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级,在负债端养老保险产品创新、资产端养老金管理和服务端养老服务供给上融合发力。

谷澍建议,银行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融资服务供给方面,做好“三个融合”。把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好;把信贷、投资、金融租赁等综合化服务能力融合好;把养老机构建设过程中的财务表现评价和发展潜力的评估融合好,引导信贷资源更多向养老产业倾斜。

二是养老金融供给方面,要进一步统筹好城乡联动,全力保证养老服务的延续性和获得感。

三是要提升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域的养老金融服务水平,加大网点在县城城乡结合部的布局力度,特别是要融合好新市民、务工人员养老金融的服务需求。

四是共建金融服务生态,做好政、银、企三方结合,增强养老服务方面全社会的联动合力。